

栏目主持人的话

主要发生在198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规模较大的思想争鸣。研究这一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争鸣,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第一,人道主义概念的确切涵义是什么?在当时的争鸣中,很多论者使用的人道主义概念并非是一致的,因而一些问题的争论其实无法形成焦点;第二,人道主义在西方的历史进程是怎样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是当时争鸣的中心之一,两者都源于西方,因而梳理清楚西方人道主义的历史进程,对于认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无疑是必要的;第三,这场思想争鸣对于当代中国思想史的意义是什么?30年的时间洗礼,也许能使我们对此有所回答。基于以上考虑,本期发表了三篇相关的文章:赖辉亮的文章试图厘清人道主义概念的内涵,使得何谓人道主义进一步明晰化;杜丽燕的文章指出了西方人道主义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然而其核心都是培养人性为善,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儒家不也有讲性善、重人道的传统吗?陈卫平的文章着重阐发了这场争鸣的意义,在于它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重要环节。这场争鸣应当还有其他的意义,而这需要我们继续研究。

(特约主持人 陈卫平教授)

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 的重要环节^{*}

——1980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的意义

陈 卫 平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上海,200062)

摘 要:1980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在于它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重要环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是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理论台阶;二、它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铺垫。周扬和胡乔木的两篇文章是分析这场大讨论的重要历史文本。

关键词:人道主义;价值理想;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1980年代无疑是这震撼力量的思想原点。发生在这个年代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以下简称“人道主义大讨论”),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场大讨论始于1978年,而以1983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民日报》1983年3月16日)达到高潮;在胡乔木1984年发表以批评周扬上述文章为主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4年1月27日)之后,这场大讨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1&ZD0085)的阶段性成果。

论很快就趋于沉寂了,如胡乔木自己所说,没有不同意见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和讨论了。^①中国的崛起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引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重要环节。这表现在它是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理论台阶,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铺垫。它由此而显示出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意义。

一 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理论台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大讨论展开之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践和理论构建刚刚起步。因此,在1980年代初期,这一道路和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几次说过意思类似的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②要形成对此的清醒认识,明确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无疑是不可或缺的;而人道主义大讨论正是走向清醒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一个台阶。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这是邓小平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时,就萦绕在脑际的问题。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摒弃了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所谓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揭开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序幕。时隔不到一年的1979年9月,叶剑英在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所作的庆祝建国30周年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③其主要内涵是高尚的理想、道德、文化,这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最初理论表述。1980年邓小平再次重申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关系,等等。”^④这就进一步显示了建设精神文明的价值理想的意蕴。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明确举起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同时十二大政治报告的第三部分专论“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如果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这里的“重要特征”和“重要表现”显然是就价值维度而言的,而“片面性”就是指丢弃了价值理想。1983年4月邓小平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共产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⑤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落实于培养“四有”公民,显现出人的全面发展的意向。可以说,提出精神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清醒认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起点。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认识轨迹,大体上是这样的:从上述邓小平理论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规定其根本任务是培养“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提出了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再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来构建和谐和谐社会,认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和本质属性。从中不难看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认识,是从比较宽泛的精神文明到定位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都是考察人的价值而得出的观点,而人的价值问题正是人道主义大讨论的中心。因此,这场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定位起到了思想过渡和理论准备的作用。

① 龚育之《几番风雨忆周扬》,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本文对于1980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大讨论的考察主要以这两篇文章为主,凡引自这两篇文章的引文,不再另行注明。

②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8页。

④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页。

⑤ 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周扬和胡乔木的文章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他们都注意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维度的意义。他们以此为基础,在人道主义讨论中探索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周扬说“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这里讲的“目的”无疑是价值目标的意思。胡乔木在1981年1月致信《人民日报》负责人时,就希望该报阐发“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前途(有理想)的制度”,可见,当时他已在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问题。他作为上述叶剑英、邓小平论及精神文明的文章和十二大政治报告的起草者,对精神文明所具有的价值理想的内涵,自然是十分清楚的,甚至可以把这看作是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独特的理论思考。^①他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不仅要有物质目的,而且要有精神目的;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物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唯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一样,它有强烈的社会主义特点;^②他还在批评周扬的文章时说“我们党的十二大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是讲人道主义嘛!”^③意谓精神文明建设真正体现了人道主义强调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思想。由上述可见,周扬、胡乔木尽管存在分歧(下文将会论及),但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思考上,却表现出共同的趋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维度,进一步指向了人的价值问题。于是,人道主义大讨论实际上成了将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定位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的前奏。

成为这样的前奏,并非偶然。因为周扬和胡乔木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思考具有相当的理论自觉。这当然和他们长期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高层领导人(胡乔木当时已执掌意识形态领域)的身份是分不开的。周扬指出“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这是中国党的一大弱点。”这不仅表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面临的问题;他引用毛泽东“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还是一个很大的必然王国”的话,强调在“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这些都表明他投入人道主义大讨论,是试图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其价值目标提供新的理论。胡乔木在“人道主义大讨论”余波尚存的1984年春天,提出要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一个思想上的大党、理论上的大党”;如果“单凭过去的经验和现成的理论是不行的”,应当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做出新的理论创造。^④价值是就人们的需要而言的,因此,需要是研究人的价值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研究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一个基本问题。对此,胡乔木说“具体地研究人们的需要,具体地研究如何发展和改进我们的各项建设以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是我们必须积极进行的科学工作(应该承认,这一工作还没有引起全党的注意)”。显然,他撰写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是为了引起全党对于人的价值问题的注意^⑤,是其进行这方面科学工作的一种努力。

尽管周扬和胡乔木都具有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理论自觉,但两者的理论立场颇为不同。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总体上有两个基本的理论立场:一是解放思想,冲破以往的尤其是长期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假社会主义的种种本本教条的禁锢;二是批判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如他在1981年所说“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⑥在“人道主义大讨论”

^① 参见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453、420、454—455页。该书指出:1981年经由胡乔木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表述为“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第455页)。由此联系到他在人道主义大讨论中,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伦理原则,可见,从精神文明来思考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是其一贯的思路。

^② 卢之超《回忆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部编《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65页。

^③ 王若水《周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后探索》,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27页。

^④ 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499页。

^⑤ 应当说,胡乔木对此有自觉的关注。1980年5月《中国青年》发表潘晓的信,围绕“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展开讨论。这是“文革”后在广泛的社会大众层面具有重大影响的关于人的价值问题的讨论。胡乔木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肯定“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有合理性(见《中国青年》1980年第8期)。这与当时已在展开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是有理论联系的。

^⑥ 邓小平《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79页。

中,周扬指出教条主义与历史上的经学独断论一脉相承,“封建时代,我国经生讲究家法,师之所传句句都是真理,一字母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因而强调“我们不应该被习惯的惰性作用所左右,必须克服穿新鞋走老路的倾向。”这更多地体现了前一个理论立场;而胡乔木明确表示,遵循“小平同志在二中全会上关于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讲话”,“参加这场维护马克思主义思想阵地的争论。”^①这更多地体现了后一个理论立场。

周扬的文章指出:在理论上,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认为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的片面性,而“文革”把这种片面性发展到了极点,为林彪、“四人帮”“推行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制造根据”;因此,拨乱反正,应当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反对一切“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异化现象,认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目的本身’”。这些观点确实是对视人道主义为修正主义的“老路”的勇敢否定。从否定“老路”出发,周扬的文章在实践上关注当时初露锋芒的各项改革,指出“掌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思想,对于推动和指导当前的改革,具有重大的意义”;认为解放思想、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为了克服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思想异化、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从而达到重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的目的。当时以生产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优越性显然不是“一大二公”,而在于劳动者作为人的主体价值和个性受到了以往所没有的尊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用异化来说明改革的必要性,并无不妥(当然这是可以商讨的)。然而,在改革之初,就意识到它不仅具有具体的目的,更有克服异化而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则是很有见地的。周扬还引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指出的例证,即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等地居民,为了扩大耕地,砍光了森林,虽然当时收到了效益,最后导致这些地方成了荒芜不毛之地;说明由于认识的盲目性,劳动的成果异化为灾难;认为这应该在改革中引以为戒。这触及到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无疑是富有远见的。总之,周扬以人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表达了对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的思考。这显然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而否定人道主义的“老路”直接对立的。

胡乔木的文章说“现在确实出现了一股思潮,要用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立足于批驳这股思潮,他在理论上指出,尤其需要注意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伦理原则、道德规范的区别,由此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在世界观和历史观上的根本对立,因而容易混淆两者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是不足取的;同时,在明确人道主义“从属于一定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把它当作社会主义社会生活中对待人的一项伦理原则”,这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些观点的着眼点,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的思潮是模糊了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模糊了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现象区别的邪路。应当说,对人道主义作上述区分,在理论上有助于进一步理清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从不走“邪路”出发^②,胡乔木指出“一个思潮有它自己发展的必然逻辑”,认为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思潮把异化概念引伸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实践上必然会“引起很不好的社会效果”。比如,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处处存在异化,就会产生对社

^① 邓小平在论述“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时,明确指出“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41、42页)

^② 胡乔木对精神文明问题的思考,凝结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该报告指出“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任务,……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卢之超《回忆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部编《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68页)

会主义制度的“不信任情绪和悲观心理”;还有“由于个人愿望未能得到满足,就抱怨‘人的价值’被贬低了,‘人是目的’被忽视了,‘不把人当人看了’,“嚷嚷‘人被当作手段了’,人‘异化’了”等等,从而导致极端个人主义。他还指出这种马克思主义人道化思潮有着国际背景,与西方“马克思学”(把留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痕迹的早期马克思说成是成熟的马克思)相呼应,“那么不难想象,若干年后,将会产生怎样的恶果”。这种担忧在当时并非是无的放矢。总之,就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维度而言,胡乔木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限定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要求的总体中”相对于最高层次的共产主义道德而言,处于较低层次而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伦理原则。他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限定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的伦理维度,显然是为了与抽象地将“人的价值”之类作为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马克思主义人道化的邪路分清界限。^①

一个反对走老路,一个反对走邪路,这就为明确什么是正路提供了理论借鉴。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后来明确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作为价值理想,既否定了将人道主义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的老路,也抵制了戈尔巴乔夫式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邪路。

二 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铺垫

邓小平把“什么叫社会主义”和“什么叫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来,意味着对前一问题的清醒认识与对后一问题的清醒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清醒地认识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也就表明了它清醒地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以江泽民2001年的“七一”讲话为标志的。这个讲话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②这意味着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与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同步的。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理论界关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主要有两次:第一次就是本文论述的人道主义大讨论,第二次就是在江泽民上述的讲话之后。前一次是因为人道主义的产生和历史进程始终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紧密相关(下文将会论及);后一次是因为江泽民的讲话把人的全面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相联系。第一次基本上是自发形成的,第二次则由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动。两者相隔近20年,连贯它们的链条是:人道主义大讨论起到了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铺垫的作用。所谓铺垫作用,就在于这场大讨论凸显了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基础性地位,而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被遮蔽了相当长的时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以此来揭示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他们从早期到晚期的很多重要著作,对此都有深入的论述^③,最简洁表达了这一点的,是1894年1月恩格斯在其逝世前的十几个月,应《新纪元》周刊之请,用概括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新纪元,以区别于但丁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难”的旧纪元时说的话“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

^① 人道主义大讨论沉寂之后不久,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很快导致苏共和社会主义苏联的垮台。周扬报告中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部分的主要起草人,长期宣传“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在苏联社会主义垮台后,公开声明改变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信念。(参见卢之超《回忆胡乔木》,《胡乔木传》编辑部编《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这些证明了分清这样的界限是有必要的。

^②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论“三个代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

^③ 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

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①这就鲜明地表达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原理之一。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以开展欧洲工人运动为主题,因而其理论范式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他们对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终身思考,并没有脱离这样的主题和理论范式。纵观他们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中贯串着这样一条主线:揭露私有制下普遍存在的异化现象,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剥夺人(尤其是劳动者)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强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创造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共产主义社会。^②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中的一条基本原理。这是指向未来新社会的价值理想,而新社会是要借助政治革命来实现的。于是,这一基本原理在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中,就有可能遭到遮蔽,即突出和强调的是与政治革命直接相关的基本原理,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等,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地位则被淡化甚至隐没。

这种可能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那里曾经成为了现实,而且为时不短。毛泽东在很长的时段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其理论范式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在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走出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因此,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凸显、发挥和创造(包括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基本上偏重于政治革命领域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注和思考,比之马克思、恩格斯,是大为弱化,甚至是倒退的。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正式的文章和报告中,只有两处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主义价值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第一处是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说“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③第二处是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结论中,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两段话“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条件。”指出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广大人民也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因此要恢复他们的个性,就要进行革命斗争”;“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能发展”。^④前一处的论述正确地指出了要求个性解放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是必要的。后一处的论述就不那么正确了,因为毛泽东接着把个性分为“创造性的个性和破坏性的个性”,前者如“模范工作者”、“劳动英雄”等,“它同党性是完全一致的”;后者则是“越出了无产阶级的轨道,同党性不一致”。这是把个性归结为高度自觉地同化于无产阶级集体之中,“集体主义就是党性”^⑤所以,“创造性的个性”是依附于集体的。这在实际上是用集体主义消解了个性。当时的周扬也是这样看待个性问题的。^⑥人的全面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因而以个性的自由发展为价值内核。一旦个性被消解了,人的全面发展就失去了立足点。可见,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有极个别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正确论述。上述两次讲话只相隔37天,如果把第二处讲话

① 《致朱泽培·卡内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9页。

② 《资本论》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它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性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得工人畸形发展。因此工人阶级必须进行革命,建立起“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49页)

③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

④⑤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15—416页;第416—417页。

⑥ 周扬1941年在《郭沫若和他的〈女神〉》中肯定“个性解放”是“五四留下的光辉业绩”;但不到一年,在《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中,则改变了说法“解放个性曾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主题”,但是,“在这个新时代,解放个性的斗争,应当属于解放民族、解放社会的斗争”,“尤其在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人性应当从属于集体,最好的个性应当是集体性表现得最强的”。(《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52、397页)

理解为第一处讲话的引伸,那么,第一处讲话的正确性也要打折扣了。其实,第二处讲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比第一次讲话要多很多,但这个讲话没有被毛泽东在生前收入《毛泽东选集》,这不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论述不那么正确,而是因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基本上从他的理论视野里淡出了。事实上,他在社会主义时期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基本上限于学校教育,并且越来越贬低学校教育对于人的培养 and 发展的作用,片面强调在阶级斗争和体力劳动中教育人、锻炼人。由上述可见,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毛泽东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中被遮蔽了。

人道主义大讨论开始拨开了这样的遮蔽。周扬指出“对人的问题的探讨,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许多年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侧重于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方面”,但“阶级斗争、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不是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记了”;而“马克思从他成为共产主义者的第一天起,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因此,应当认识到“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关心人、尊重人的”,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现实的、人道主义”,于是,“马克思主义与以往的人道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理想的现实依据和方法”。这意味着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就要澄清以往遮蔽的迷雾,恢复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地位。胡乔木强调了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以后,异化不具有“基本范畴和基本规律”的意义。然而,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后者是前者的对立面。因此,当异化成为人道主义大讨论的焦点之一,就不能不促使人们意识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的重要性。对胡乔木来说,也是如此。汝信在“人道主义大讨论”刚兴起时,发表了《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人民日报》1980年8月15日),指出“当马克思开始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踏上自己的发展道路时,他所最为关心的也正是人的问题”,其宗旨“就是要为人类创造一个更适宜于人们生活的新世界,使人能够真正得到充分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胡乔木对此文曾予以肯定,^①自然会关注到了这样的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重要问题的论述。因此,尽管他的文章没有像周扬那样,浓墨重彩地阐述人的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②但其提出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具有重要的迫切的现实意义”,实际上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地位,有不少论述涉及到了这个问题。比如,“必须尽一切可能减少人们的痛苦和不幸,满足人民在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中的迫切需要,反对漠视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切身利益的官僚主义恶习,尽一切可能改善劳动条件”,等等。因此,经过人道主义大讨论,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

造成这一呼之欲出的理论根基,是人道主义大讨论的主流突破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绝对对立的禁锢。从西方思想发展史看,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人道主义的产生和历史进程密不可分。“人道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 *humanitas*,意谓“人道精神”,最初的含义是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教育制度。古罗马的西塞罗最早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自文艺复兴以来,推崇人的全面发展一直是人道主义思潮的最终的价值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深刻地指出,以往的人道主义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人道主义从“抽象人”和“抽象的人性”出发,因而它们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缺乏实现的科学根据,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和丢弃人道主义的这一价值理想,而是在将其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予以继承,因而在他们的理论旗帜上始终鲜明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基本原理和价值理想。就是说,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具有一致性的关键链接点。因此,在与人道主义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原本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① 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482页。

② 这是由上述的胡乔木文章站在批判右的错误的理论立场所决定的。他承认自己的文章“过分政治化了”(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第494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本文关于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容易将人的全面发展予以遮蔽的观点。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必然会遭到遮蔽。

与人道主义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中国占据过主导地位。对此,周扬是亲历者。在延安文艺界整风前,他曾用“人道主义”来称赞鲁迅等一些作家的思想。此后,他开始避讳人道主义一词,在评论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家如惠特曼、塞万提斯时,就用“反对人压迫人,人奴役人”来饶过人道主义。^① 1949年以后,他在很多报告中把人道主义归之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而大肆批判。诚如他在1983年回顾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对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有关文艺作品的评价,曾经走过一些弯路。……那个时候,人性、人道主义,往往作为批判的对象,而不能作为科学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的”。

人道主义大讨论基本倾向是否定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的观点。周扬和胡乔木有着上述的理论立场的分歧,但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认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相容性。周扬指出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理想,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具有一致性,他说“我们都知道,从文艺复兴以来,崇尚人的全面发展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本标志之一。卢梭在《论人类的起源》一书中,就论述过人在精神和肉体上全面发展的主张。席勒在他的《美育书简》中更有出色的论述,他要求通过美育活动,使人获得解放,‘成为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人’。(《美育书简,第二封信》)傅立叶设想在他的未来的协作制度中,使人‘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傅立叶选集》第3卷第27页)”因此,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是与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有着思想继承关系”;由于马克思克服了以往人道主义缺乏科学根据的空想性,“找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依据和方法”就此而言,“不妨说,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现实的人道主义”。胡乔木如上所说,曾经肯定汝信的文章,而该文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概念,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致性。当然,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并没有这么说。不过,他也认为以往对于人道主义的批判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多次批判人道主义。这些批判的错误之一,是没有区别人道主义作为世界观、历史观和作为伦理原则这两个方面,把批判人道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以致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简而言之,这里实际上是说那种批判的错误,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看作绝对不相容的。^② 因此,他讲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实际上是从伦理道德上认可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具有相通性。

由于人道主义大讨论在承认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具有相容性上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这就为人的全面发展重新登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地位提供了可能。邓小平的理论为这一可能性的实现打开了合法的通道。因为这一理论开创了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于是原先在以政治革命为中心的理论范式中被遮蔽或淡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始得以彰明和显扬。^③ 人道主义大讨论对于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起到的思想铺垫作用,不正表现了这一点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凝聚起中国震撼世界的精神力量,作为确立这一价值理想的重要环节,就是人道主义大讨论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写下的值得回首的一页。

(责任编辑 付长珍)

^① 周扬《纪念〈草叶集〉和〈堂·吉珂德〉》,《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67页。

^② 胡乔木此前对此已有反思。把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看作绝对不相容的重要方面,是认为人道主义讲抽象人性论,而马克思主义将人性归结为阶级性。胡乔木1981年在《当前思想战线若干问题》(《红旗》1981年第23期)中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全部归结为阶级性的提法”是“不确切的”,“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③ 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以长期被“阶级斗争为纲”所遮蔽的两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框架的,即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理想。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和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充分表达了这一点。这两条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前者是科学根据,后者是价值理想;两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予以彰显,体现了这一理论是科学和价值的统一。

Abstracts and Keywords of Major Articles

The Political Unreality of Political Realism

(by Michael Freeden)

Abstract: This paper contends that political realists shrink the complexity of the political , confining it to macro-discussions of power , confusing realism with liberal legitimation principles , reintroducing the ethical concerns from which they sought to distance themselves , and overlooking the emotional and the vernacular. In particular , recent realists engage in prescriptive rather than interpretative analysis in which democratic and humanitarian ideals are regarded as the basis of a realist approach , ignoring the fact that a properly real understanding of the political cannot be reduced to those features.

Keywords: political realism , legitimation , liberalism , ideology

Several Factors Impac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Rites in the 18th Century

(by YANG Nian-qun)

Abstract: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rites in the 18th century should not limit itself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r the history of ideas. Rather , the transformation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a more complicated network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ordinary life. Therefore , we should not only 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ritual system and the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 but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nnectio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emperors' cultural tastes in the Qing Dynasty. By reflecting on the predicament of Confucian "dual rites" , we can see how the emperors and the gentry in the Qing Dynasty searched for the ways to overcome it , understand better the relation between textology and the "administrative practice" of rites , reevaluate the function of the imperialist examinations system , and explain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identity and rational movement of the literati with low social status in the rites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the 18th century , "dual rites" , the ritual system

A Key Step to Establish the Value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CHEN Wei-ping)

Abstrac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eated discussion about humanism and alienation in 1980s in the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lies in that it is a key step to establish the value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irst , it functions as a theoretical stage to recognize clearly the value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ond , it helps to tak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The two papers written by ZHOU Yang and HU Qiao-mu respectively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texts for examining this heated discussion.

Keywords: humanism , value ideal ,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Rethinking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Humanism

(by DU Li-yan)

Abstract: Western humanism originates in ancient Greece. A theory of humanism presupposes a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With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 Western humanism has greatly different versions in ancient Greece , medieval and modern times. Nevertheless , no matter how different its versions are , Western humanism mainly focuses upon virtue and cultivation , taking as its core the cultivating of good human nature.

Keywords: discussion about humanism , human nature , virtue , cultivation